

外交舞台上的

湖湘人物

袁南生 著

湖湘外交人物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历史上，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外交家群体的崛起，外交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湖南人。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外交舞台上的 湖湘人物

袁南生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交舞台上的湖湘人物 / 袁南生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438 - 6790 - 1

I. 外… II. 袁… III. 外交人员 - 生平事迹 - 湖南省 IV. K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2089 号

外交舞台上的湖湘人物

袁南生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思远

装 帧 设 计: 罗志义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贝特尔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24.5

字 数: 388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790 - 1

定 价: 45.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言 近代以来群星灿烂的湖南外交人物 / 1

群星璀璨的外交家群体 / 1

独具影响的外交思想 / 5

彪炳千秋的外交业绩 / 10

第一章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交思想家——魏源 / 13

第一个系统主张“睁开眼睛看世界” / 15

第一个主张向外国派使节 / 19

第一个全面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思想 / 20

第一个初步提出开放的国家战略 / 25

第二章 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 / 30

现代外交的拓荒人 / 32

“循理”外交的提倡者 / 34

误国外交的牺牲品 / 39

第三章 众说纷纭的外交人物——曾国藩 / 45

洋务外交的首家 / 47

道义外交的名家 / 49

军事外交的大家 / 52

教案外交的输家 / 56

第四章 世界级的战略家：左宗棠的对外活动和外交思想 / 65

从战略外交着想：塞防与海防并重 / 67

从实力外交着眼：谈判与武力并举 / 70

从务实外交着手：抗争与妥协并用 / 72

从长远外交着力：备战与建设并行 / 74

第五章 “东南互保” 外交战略与两江总督刘坤一 / 78

东南互保的出发点：避免战祸 / 80

东南互保的归宿点：保全疆土 / 85

东南互保的争议点：抗旨越权 / 89

第六章 曾纪泽：“弱国有外交” 的典型人物 / 97

有声有色的对英外交 / 98

虎口夺食的对俄外交 / 101

无力回天的对法外交 / 106

第七章 外交史上留下重大影响的湖南巡抚吴大澂 / 113

边界谈判的胜利者 / 114

东北开发的先驱者 / 118

对日作战的请缨者 / 120

第八章 晚清外务部第一任尚书——瞿鸿禨 / 126

老夷务中的新外交 / 128

浊风气中的清风尚 / 133

假立宪中的真较量 / 135

新变局中的老操守 / 140

第九章 胡瑛：民国历史上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 144

浓墨重彩的外交手笔 / 145

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 / 147

令人叹息的曲折结局 / 150

第十章 外交风云中的宋教仁 / 153

为“间岛”交涉提供依据 / 154

- 为外交谈判加强后盾 / 157
- 为拓展外交贡献智慧 / 159
- 为共和宪政洒尽热血 / 161

第十一章 《二十一条》交涉中的黄兴 / 163

- 救亡第一，还是革命第一？ / 164
- 主权重要，还是外援重要？ / 170
- 联合革命，还是分头革命？ / 176

第十二章 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 / 179

- 学贯中西的外交家 / 180
- 见解独特的外交思想家 / 190
- 奠基开山的外交史学家 / 202

第十三章 多姿多彩、功勋卓著的外交人物——王芃生 / 213

- 抗日型的外交家 / 214
- 军事型的情报专家 / 218
- 务实型的学问家 / 222
- 联共型的战略家 / 224

第十四章 拯救犹太人最多的外交官——何凤山 / 230

- 犹太人眼中的何凤山 / 231
- 国民党政府眼中的何凤山 / 234
- 纳粹眼中的何凤山 / 235
- 儿女眼中的何凤山 / 236
- 家乡人民眼中的何凤山 / 238
- 笔者眼中的何凤山 / 240

第十五章 外交视野中的周鲠生 / 242

- 周鲠生与“革命外交” / 243
- 周鲠生与国民外交理论 / 248
- 周鲠生与外交学会 / 251
- 周鲠生与国际法 / 254

第十六章 军内职务最高的将军大使——袁仲贤 / 259

应对新中国诞生前夕的第一桩外交事件 / 260

新中国第一任驻印度大使 / 263

运用外交资源促进西藏的和平解放 / 266

兼任新中国第一任驻尼泊尔大使 / 268

第十七章 周竹安大使的传奇生涯 / 270

武汉：死里逃生 / 270

欧洲：合纵连横 / 272

重庆：暗度陈仓 / 274

长沙：推动起义 / 277

保国：出任大使 / 284

北京：默默耕耘 / 288

第十八章 耿飚将军的外交生涯 / 291

从军人生涯到外交生涯 / 292

从政府外交到政党外交 / 298

从政党外交到军事外交 / 299

从军事外交到议会外交 / 301

第十九章 中苏关系由同盟走向破裂年代的驻苏大使——刘晓 / 303

出使苏联时间最长的大使 / 304

出使阿尔巴尼亚时间最短的大使 / 315

遭受苦难最多的大使 / 317

从事地下斗争时间最长的大使 / 319

第二十章 外交家中的藏学家：李铁铮 / 324

“南京大学”校名的提出者 / 325

外交官招考的夺魁者 / 326

中国与伊朗、伊拉克和泰国关系的开拓者 / 328

我在西藏主权的维护者 / 330

叶落归根的实践者 / 334

第二十一章 刘英：外交舞台上的非常人物 / 338

因非常原因走上外交舞台 / 338

因非常原因在外交部落难 / 344

因非常原因为世人所尊敬 / 352

第二十二章 叩开世贸大门的经济外交家——龙永图 / 357

从贵州走出来的长沙人 / 358

WTO的代名词 / 360

亚洲的代言人 / 365

别具特色的外交家 / 368

结语 湖南人、湖湘文化和湖南外交人物 / 374

星光灿烂的湖南外交人物 / 375

湖南人性格与湖南外交人物 / 377

湖湘文化和湖南外交人物 / 379

后记 / 3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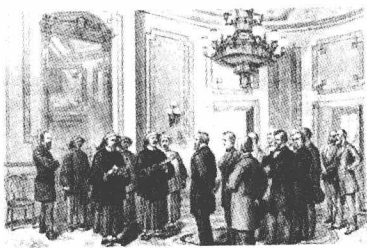
前言 近代以来群星灿烂的 湖南外交人物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湖南外交人物，包括湖南的外交思想家、战略家和实践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历史上，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外交家群体的崛起，外交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湖南人。当然，外交史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些是是非非，也离不开湖南人的影子。

群星璀璨的外交家群体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从被动到主动，从弱国外交到强国外交的历史。今天的人们谈到外交官，很容易把外交官与折冲樽俎的国务谈判、觥筹交错的豪华宴会、西装革履的潇洒风度联系在一起，以为外交官理所当然地属于上流社会人物，享有特权，受到尊敬。其实，当年可不是这么回事，那时的国人瞧不起外国人，甚至连林则徐这样先进的中国人都不了解外国人，以为英人连膝盖都不能弯曲，所以不会有战斗力；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只要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国人于死命。那时国人瞧不起外交官，认为父母在，不远游，达官显贵们都把出使国外看成是丢祖宗脸面的事情。那时朝廷与外国争执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国要求中国派使节常驻他们的国家，清政府却站在“维护国格”的高度拒绝委派，而国人也往往把卖国与出使国外联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才有清政府派美国人蒲安臣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国外的荒唐举措。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在所谓“弱国无外交”的时代环境下，湖南涌现出了一个个有代表性、在中国外交史上响当当的外交人物。例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使节是湖南湘阴人郭嵩焘。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驻外使节是从郭嵩焘开始的，仅仅这一点，就使湖南人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清史稿·表五十二·交聘年表一》说：“光绪建元，郭嵩焘、陈兰彬诸人分使英、美，是为中国遣驻使之始。”郭嵩焘先于陈兰彬两年赴



1878年，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在华盛顿白宫蓝厅递交国书。

任，所以他是中国第一任实际驻外的公使。然而，对郭嵩焘第一个奉命常驻国外这件事，时人却不以为荣，都以为耻，朝野上下，议论纷纷。郭嵩焘的故乡湖南，当时风气更为闭塞。杨度的岳父、湖南大名士王闾运编了一副对联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他的老朋友、三次担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郭嵩焘出使英国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人们对他的非议、责难和攻击，甚至伴随着屈辱。他与外国商人、低级官员握手；他向同船的外国军士起立行礼；他让自己的夫人学习外语；他让夫人出面请洋人看戏以结交朋友，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在当时都被看成是“有损国格”的“罪状”。昏庸无道的清政府将他召回，让另一个湖南人曾纪泽接替他的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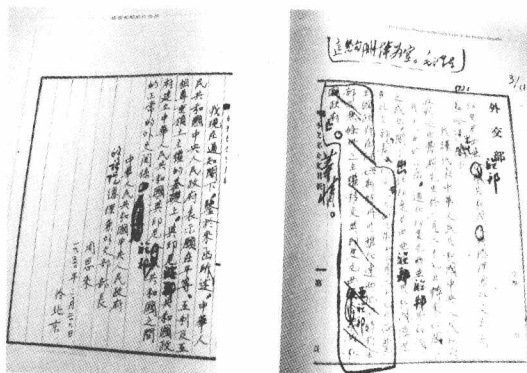
湖南长沙人瞿鸿禨是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第一任尚书。他掌管的外务部，是晚清以来外交主管机构中权力最大的，负责一切对外交涉事务，除签订条约、划定疆界、派遣使节、接待来访外，还主管通商、国防、路矿、关税、邮电、旅游、宗教事务和华工。他在索回庚子赔款余额，粉碎藏独阴谋，推动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型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湖南邵阳人蒋廷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授大使，第一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第一个既担任过驻联合国大使，又担任过驻美国大使的外交家（担任过驻联合国大使和驻美大使的还有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外交部长助理李道豫和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教授出任大使者，中外不绝于史，如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曾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圣约翰大学教授颜

惠庆先后曾出任驻德国、丹麦、瑞典、英国和苏联大使及驻国联首席代表。蒋廷黻1912年自费赴美求学，攻读近代历史，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教授，主讲中国外交史及法国革命史。他在外交上支持南京政府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深受蒋介石的关注与赏识。1934年8月，他奉蒋介石之命赴苏联考察，以蒋介石“极为信赖”的私人代表身份与苏联当局接洽会谈，促使蒋介石转变对苏联的敌视态度，转为实施联苏对日方针。蒋介石对他的莫斯科之行十分满意，复电“甚表嘉许”。1936年10月，他出任驻苏大使，在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中，他主张用和平方法救蒋，多次与苏联当局会谈，希望苏方对中共和张、杨施加影响，迅速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与苏方交涉，帮助和安排蒋经国于1937年3月返回中国。1945年，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兼联合国救济总部中方代表。在分配联合国救济物资时，不顾国民党方面反对，力主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占领区一视同仁进行分配。1947年12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职业外交生涯长达15年。1961年任“台湾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仍兼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他主张中国统一，反对台湾独立。他学贯中西，前期治学期间，编著有《清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2卷)、《最近三百年东北外交史》、《中国近代史大纲》。

湖南常德人胡瑛是民国历史上第一任外交部长，也是中国外交史上担任“外交部长”这一职务的第一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在武汉曾成立了与清王朝对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27岁的胡瑛出任外交部长。武昌起义后第三天，胡瑛与领事团交涉，争取各帝国主义国家尽可能减少对军政府的疑虑或敌意，尽可能劝阻列强给予清政府以任何形式的支持，尽可能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10月18日，驻武汉、北京的外交使团发表声明，对军政府与清政府的对立持中立态度。这一声明的发表，意味着列强不是把清政府看成是合法方，把军政府看成是非法方，而是看成交战双方，这对军政府来说，是外交上的大胜利，是胡瑛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湖南辰溪人刘晓是出使苏联时间最长的大使，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新中国建设争取外援最多且质量最高的大使。1955年到1963年，他出使苏联长达8年之久，这一时期刚好是新中国加强建设的时期，迫切需要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外交部文件。

助。刘晓出使苏联时期，是苏联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的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实施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工程。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特别是苏联帮助建立建造核弹、导弹生产的企业和提供了一些相

应技术。这与刘晓积极做工作是分不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时11位将军大使中，来自于湖南的最多，有4位。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随着与新中国建交国家数量的增加，向建交国派遣驻外大使便成了当时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难题。毛泽东以其巨人的气魄和战略家的眼光提出我国外交官队伍从军队中调，从将军中找。于是，一些身经百战、戎马半生的人民解放军正军职、副兵团职甚至是正兵团职的高级将领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出任驻外大使。他们是黄镇(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出使匈牙利)，耿飏(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出使瑞典)，袁仲贤(三野代参谋长、第八兵团政委、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出使印度)，韩念龙(三野第三十三军政委、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出使巴基斯坦)，王幼平(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出使罗马尼亚)，姬鹏飞(三野第七兵团副政委，出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彭明治(四野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出使波兰)，谭希林(三野第三十二军军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出使捷克斯洛伐克)，倪志亮(四野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出使朝鲜)，曹祥仁(四野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校长，出使保加利亚)，冯铨(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联络局局长，出使瑞士)。由于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人们亲昵地称他们为“将军大使”。11位将军大使中，袁仲贤和谭希林是长沙人，耿飏是醴陵人，彭明治是常宁人，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11位“将军大使”中，有6位先后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或部长职务，他们是姬鹏飞、袁仲贤、耿飏、黄镇、王幼平、韩念龙。11位同志如今均已作古。

耿飚既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大使之一，又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主管政党外交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还担任过国防部部长，可以说集外交家、军事家于一身。耿飚在1950年出任中国驻瑞典兼驻丹麦、芬兰大使。在瑞典，耿飚广结朋友，特别是同瑞典名士哈马尔舍德结下了友谊。哈马尔舍德后来成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作为在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耿飚的努力之下他顺利地访问了新中国，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热情接待。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位瑞典军官问耿飚带过多少兵。耿问答说：“大概十几万人吧！”那位瑞典军官立即立正敬礼回答说：“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呀！”耿飚后来又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驻缅甸、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回国后先后担任中联部部长、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中顾委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独具影响的外交思想

湖南人富有思想，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思想史上，湖南出了不少外交思想家，他们提出的外交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且有的对当前和以后的外交事业，仍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思想的产生是从湖南邵阳人魏源开始的。在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比较系统地了解西方世界的晚清士大夫中，魏源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林则徐虽然也可与魏源一比，但他忙于政事，其角色主要是一位政治家而非外交思想家。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是湖湘文化和中国书生民族责任感的典型体现。鸦片战争是在中国人上上下下都不知天高地厚，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知现代外交为何物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中国人被欺诈、高压的情况下结束的。在对鸦片战争冷静思考的基础之上，作为中国近代放眼看世界的人之一，魏源以对世界的全面介绍、全新认识为基础，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外交战略，即联合其他国家来打击侵略者，在外交斗争中利用矛盾，团结其他国家来对付侵略者，在外交斗争中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制胜侵略者的主张。魏源的上述思想被誉为中国现代外交思想的先驱。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没有人采纳

他的思想，其思想传入日本后倒发挥了作用。一位日本学者为此感慨：

“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湖南湘乡（今双峰）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丰富了中国外交哲学的内涵。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既是中国一再为列强宰割的时代，也是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外交十分难办的时代。按李鸿章的说法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说过，中国外交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他认为，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可惜，当时许多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宗旨，对策略上暂时、局部和必要的妥协一律斥之为“卖国”。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展“洋务”的，他的外交思想是以中国的传统哲学为基础，围绕着当时深深困扰朝野上下如何处理同西方列强的关系这个问题而逐渐深化的。曾国藩的外交思想，着眼于如何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他把自己的外交哲学思想概括为四个字：一是“争”，认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要据理力争，他说：“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从乾隆皇帝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所谓礼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朝廷仍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这类纠纷甚至成为触发或激化中外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在今天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礼宾常识，而在当时清廷看来，却视为是“体制攸关”的大事，不肯让步呢？这背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国体。曾国藩主张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绝不让步，在其他问题上则应当灵活处理。二是“诚”，主张与各国推诚相见。三是“信”，主张信守和约，增强自信。19世纪西方列强在中国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总的说来在中外冲突中，中国是正义的一方，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方面在中外冲突中的一切行为都是无可指摘的。不能低估长期宗法专制统治和闭关锁国造成的愚昧在对外交往中的负面影响。例如，当时，反对洋人入城的事件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在一些地方大吏和士绅看来，让一些外国人依照条约进入一些地方的城内做生意和游览简直是奇耻大辱。因此，千方百计

激励“民气”，拼死抗拒。有的事件(如广州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反入城斗争)还成了诱发祸国殃民的大灾难的重要因素之一。曾国藩所说的“信”，首先就是针对那些“显违条约，轻弃前约”的错误行为而说的，希望以此引导有关人士以理智的慎重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这与那些逞气蛮干、不顾后果的短见浅识相比，自是棋高一着。四是“和”，主张外敦和睦，在对外关系中确立以和为主的方针。“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盖恐群情懈弛，无复隐图自强之志”。他认为必须信守和约；避免激化矛盾，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双方冲突；着眼大局，不在小事上纠缠。他一再主张的是，应以自尊、自强的态度去对待外国，这与“妥协投降”当然风马牛不相及。在近代中国，好些学习西方的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例如：《几何原本》明末翻译出版了其中的前六卷。19世纪60年代，李善兰完成前人未竟事业，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译出后九卷，令中国人得睹全帙。曾国藩极力支持，承担了出版费用。派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增设翻译局，他都是主要决策人，而这些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良好的作用。洋务运动的开端和重要内容在于购买和仿造西方船炮。就仿造而言，均发轫于曾氏。值得指出的是，曾在学习西方中不忘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毛泽东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不轻易公开表示服人，他为什么说“独服”曾国藩，值得我们深思。当然，曾国藩是有名的儒生，并无太多外交实践经验，或者说，由于曾国藩一生中主要精力在国内战事和政务中，所以，他对当时欧洲列强文明实质的认识和把握，不可能很清楚。有人认为曾国藩在外交中对洋人常“以君子之心去度小人之腹”，显得有些迂腐。李鸿章在一次向曾国藩讨教外交方略的时候，曾国藩以儒生的“忠、信、笃、敬”原则教导之，他认为外国人也一定能够被中国儒家的处世原则所感化。对曾国藩这种将中国伦理观泛滥到对外政策上的想法，有人不以为然。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讨论到中国当时的外交时也是这样说过：当时中国的一些人总是以道义原则去看待西方对外扩张行为，而一些西方人则是以贱买贵卖的商战原则一再哄弄着坚持这种道义原则的中国人。不管怎么说，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对晚清外交，对李鸿章这样的晚清外交大员曾产生明显的影响，但两者的外交思想不能混为一谈。

湖南湘阴人左宗棠的外交思想在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左宗棠主要是政治家、军事家，但他晚年身为封疆大吏，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负责外交事务，他的外交思想直到今天仍有特别的价值。他提出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用外交和军事两手收复伊犁的意见。他是晚清大臣中把主战的大旗举到生命终点的人。左的外交思想以强硬主战为鲜明特色，他认为即使再妥协退让，也满足不了列强的要求。左宗棠外交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是主张“诤以求伸”，认为外事中“有可迁就者，有不可迁就者”，清廷将外国来使一律看成是“贡使”，坚持见皇帝要三叩九拜，外国则一直要求中国政府按国际惯例接待使节，左宗棠认为外国不是中国的属国，不必“以中国礼法苛之，强其从我”，主张满足外国使节诸如此类的要求。但对洋人谋求已签条约之外的利益，则主张坚决予以拒绝。左宗棠外交思想中的闪光点是他认为“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主张以“韬光养晦”的态度办理外交，像越国勾践对吴国“屈意下之”，汉文帝对南粤“卑词畏之”那样，达到“反弱为强”的目的。左宗棠主张“屈伸外交”，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又体现出强硬外交的本质。史学界认为，他是自唐太宗以后对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就连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也这样评价他：“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

湖南长沙人黄兴的外交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是支持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共同对日，暂时放下自宋教仁遇刺、第二次革命发动以来就高高举起的反对袁世凯的旗帜，还是借重日本的力量继续反袁斗争，从而很可能使革命党人无意当中成为日本手中一张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牌，迫使中国在抵制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方面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中国很可能就会因此丧失更多的权益？这对正流亡在美国的黄兴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选择。黄兴明确提出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使党派利益服从和服务于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不计前嫌，主动与夙敌暂时言和，号召革命党人暂时停止反袁斗争，联袁救国，与他们一直坚持要予以推翻的北洋军阀政府合作，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后来从“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其思路与黄兴从“倒袁救国”转为“联袁救国”是一致的。

在中国现代以来外交史上影响最大的外交思想之一是毛泽东的外

交思想。他的外交思想还影响到世界政治格局。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思想，这个思想既清晰地表明了新中国的政治倾向性，也昭示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同时，还提出两项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和



毛泽东接见苏联首任驻中国大使罗申（1949年10月16日）。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的含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束缚”，建立起新中国的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含义是“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然后再视其是否友好而决定是否把他们当客人请进来。“一边倒”的外交思想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新中国外交在当时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的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外交思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苏关系一步步全面恶化，毛泽东不再幻想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断然放弃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国际战略，逐步把苏联作为中国的对立面，形成了60年代的反帝、反霸的外交格局。毛泽东的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外交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中间地带”理论之上的。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指亚、非、拉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另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样，就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和原来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部分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仅是战略上存在可能性，而且也是一种利益上的需要。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为中国在世界上开拓新的外交领域，指明了明确的目标。

毛泽东在70年代提出了遏制苏联威胁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建立在他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之上的。所